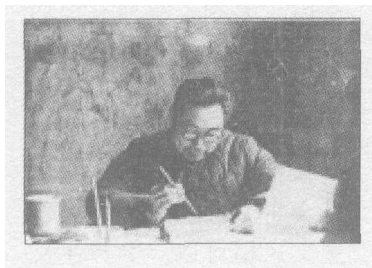


周恩来的改稿艺术

◆ 张同刚 张同铸



周恩来长期担任国家总理，日理万机，但他处理文稿时一丝不苟，不少修改实例耐人寻味。

画龙点睛

1952年10月2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，社论原题为《坚决保卫和平，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结束》，周恩来将其改为《坚决保卫和平，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！》。如果我们了解社论写作的时代背景，便可悟出这一修改的妙处所在。“争取”是力求获得、力求实现的意思，语气平缓，留有很大的余地，而“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奋斗到底！”旗帜鲜明的态度，且语气掷地有声，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，非大手笔不能为也。

1964年举国欢庆建国15周年时，在北京隆重上演的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是周恩来倾注了自己心血浇灌出来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。这部有三千多人参加演出的史诗，融歌、舞、诗于一体，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、发展、壮大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，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。关于舞蹈史诗的名称问题，此前上海搞的大型歌舞《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》这个题目太长，有人建议用“东方红”。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，既精练又切题。

字斟句酌，高屋建瓴，是周恩来画龙点睛地修改文稿的常用方法。1954年，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，指示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，放映了《一九五二年国庆节》，让外国人从电影里看看中国，了解中国。谁知电影放映后，有美国记者说：“这部电影说明，中国在搞军国主义。”周恩来并不生气，他让再放一部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工作人员为这部片子准备了长达十六页的说明书。周恩来要求只在请柬上

写了一句：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，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在西方可谓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，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会是啥样？简短的标题式的说明书吊足了胃口，结果不出周恩来所料，观众看得如痴如醉，反映很好。

1972年7月，周恩来出于安全原因，劝说西哈努克亲王不要到西非去访问。他要亚非司以周恩来的名义写一说帖。亚非司起草的电报，叙述因由较详，用词有些程式化。因情况紧急，周恩来来不及请亚非司的同志到西花厅去修改，只能自己动手。说帖简明扼要，总共不过三五百字，其中让外交官李樵记忆最深的一句：“柬埔寨全国七百万人民的命运，系于阁下下一身，望阁下此次暂缓前往西非访问……”周恩来紧急改说帖的事，不仅说明了周恩来对西哈努克亲王的关怀备至，更说明了他字斟句酌的严谨精神。

“推敲”的故事流传甚广，周恩来改刊名、地名演绎了“现代版的推敲”。他在

为《知识就是力量》题写刊名时，对刊名进行修改同样体现其高超的修改艺术。知识就是力量，是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，也是苏联《知识就是力量》杂志的刊名。这个刊名，1956年前，国内一直译作“知识即力量”，因此，请周恩来题写的刊名也是“知识即力量”。可是，周恩来却题写了两种刊名，一种是“知识即力量”，一种是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周恩来的秘书附了一封短信，转达周的意见说，刊名如用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更为有力，更符合通俗化的要求。但究竟用哪个要请编辑部自己决定，因此写了两种刊名，供你们选择。周恩来的这个改动使刊名通俗易懂、更加大众化，语义更鲜明，着眼更深远，读起来铿锵有力，更有节奏，更加响亮。鬼城丰都，中外扬名，它以前的名字叫酆都。1958年周恩来查勘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来到酆都，县委负责同志汇报酆都县粮食生产由1949年的2亿斤上升到1957年的4亿多斤时，周恩来满意地点头，看到酆都的“酆”字难写难认，他说：“现在酆都县年年丰收，就把‘酆’字改成丰收的‘丰’字嘛！”遵照周恩来的意见，经酆都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，上报四川省人民政府转国务院，于当年9月22日批准，正式改名为丰都县。改名后，丰都的

“丰”字既好记好认通俗易懂又寓意丰收，真可谓一字立骨、片言居要。

标语，一般文字简洁精练。周恩来却能发常人所未发，修改后的标语更加具有宣传鼓动作用。1959年1月8日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参观广东从化县溪流小学，看到墙上有张标语“人人要讲普通话”。他点头赞好，但建议改为“人人学讲普通话”。一字之改，区别很大。“要讲”带有强迫性，非讲不可。但南方不同于北方，小孩子不同于成年人，硬性规定要讲，反而不切实际。改为“学讲”则大不相同，孩子们可以先学后讲，老师也有责任教学生怎样讲普通话，这正是学校的任务。

点石成金

点石成金，就是稍稍改动原来的文字，使它变得表述更准确、精练，内涵更深、更远。点石成金的修改范例在周恩来改稿艺术中最常见。

周恩来改稿经常反映他对事物发展的本质认识，是其最新思想的体现。对别人文稿的修改，处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睿智。1970年3月4日，周恩来在审改新华社关于防止血吸虫病会议

的新闻时，将“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”改为“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的协作精神”。当时许多同志也许还不能理解周恩来这一改动的深刻含义。1971年6月6日，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时，看到一张照片说明中有“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”的提法，当即指出：这样提法不好，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，应该是提社会主义大协作，讲共产主义风格可以，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都还未经过嘛！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，谁也没见过，理想和现实之间，有很大的距离。从这一修改可以看出周恩来修改文稿的思想是多么具有前瞻性。

1964年6月，周恩来陪同朝鲜的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。在迎宾文艺晚会上，曲作者王双印演唱了自己最新创作的歌曲《干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》。演出结束后，周恩来亲切地会见他说：“这首歌写



得很好，曲调明快，歌词形象生动。若把‘毛主席思想’改为‘毛泽东思想’就更为准确了，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是集体领导的智慧嘛！”

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地审稿是周恩来改稿的一贯态度。1962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稿中写了这样的话：“印度不仅要中国承认它已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是合法的，而且还要中国拱手让出更多的领土，特别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大片领土。”周恩来审稿时，把后边“特别是……”这句删去了。本来，凡是中国的领土都不能拱手让人，这里根本不存在哪一块领土“特别”不能让的问题。写了这个短句，不仅画蛇添足，而且容易引起误解。¹

周恩来反对使用绝对化的词语，而是留有余地，以免给工作造成被动。1960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稿说：“我国人民向来对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组织，绝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”。周恩来将后半句改为“是有足够认识的”。1972年2月19日，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：你们新闻报道中说尼克松政府在越南陷于“无法解脱的苦恼”，我改为“难以解脱的苦恼”。前者把话说绝了，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；后者用“无法解脱”也不符合实际。

锦上添花

修改别人的文章，尤其是别人的好文章，有时容易出现画蛇添足甚至点金成铁的尴尬现象。然而周恩来修改别人的文稿，却是篇篇都提高了质量，其中有些堪称锦上添花的典范。

1945年12月15日，周恩来致函郭沫若，为了使《棠棣之花》一剧更臻完美，他逐字逐句推敲了剧本，从郭沫若是四川人，不熟悉北方常用语，到“你”和“您”字的准确运用，一一提出意见。函曰：“沫兄：剧本读过，我在字句上的斟酌，另纸书上，请考虑。”这个“字句上的斟酌”，竟长达二千余字。1964年9月25日，周恩来对大型歌舞《东方红》朗诵词作了十四处修改，比如第二场（之一）把“染红了黄浦滩、珠江口、湘江岸……”改为“染红了黄浦滩头、珠江堤岸、湘江两岸……一直到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。”²汉语四音节结构在音韵上是一个优化组合。周恩来将原稿三音节词改为四音节，更具有乐感、美感。

1965年2月14日，周恩来修改吴冷西、乔冠华起草的《联合国往哪里去？评戴高乐二月四日的讲话》一文。文中说：“不久以前，我

国周恩来总理提出，联合国必须改正错误，彻底改组，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。”周恩来加写：“还有西非一些国家的首脑或政府，也认为联合国犯的错误太多，必须加以改组。”修改后，论据更充分了，联合国改组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要求，而是许多国家的要求。

锦上添花的修改文稿的方法，突出的不是表现在局部上而是表现在整体上，主要的不是表现在形式上而是表现在内容上：或则充实了事实，或则深化了主题，或则突出了宣传目的。主要原因是：周恩来对别人的文稿，总是致力于具有整体意义的高屋建瓴式的精益求精的修改。

参考文献：

¹崔奇：《高瞻远瞩 回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国际宣传的关怀和指导》[J]. 外交学报，1999（3）27、25、15-16

²周恩来修改稿见《党的文献》1995年611-13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南京大学）